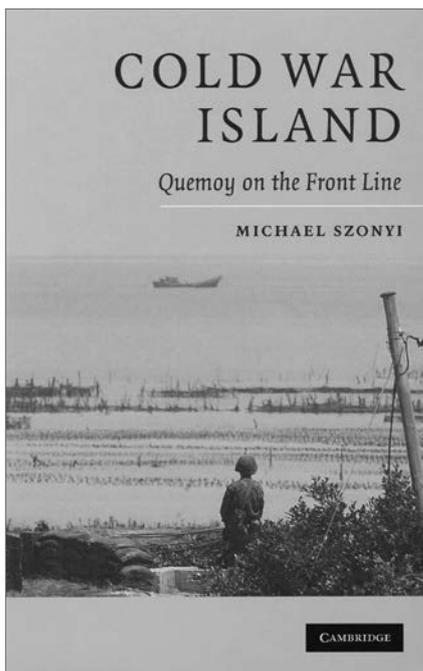


冷戰格局操控下的地區命運

——評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 何志明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標誌着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全球冷戰格

局正式宣告結束。政府檔案的解密、學術禁區的開放，使得國際學術界隨之掀起了冷戰史研究的熱潮，並產生了一大批聲譽卓著的研究成果。這些論著大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以冷戰格局下的宏觀視野，如大國外交、政策演進等層面，來考察冷戰史，而以地區為研究個案進而展現其歷史細節的論著則並不多見。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2008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冷戰島：位於前線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以下簡稱《冷戰島》，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以國際化的研究視角，運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獻以及口述資料，對冷戰格局下的金門社會歷史變遷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該書對冷戰格局影響下的地區命運進行精細描繪，不僅豐富了學界對於冷戰史研究的新認識，而且為冷戰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宋怡明的《冷戰島：位於前線的金門》一書，運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獻以及口述資料，對冷戰格局下的金門社會歷史變遷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它不再簡單地將金門視為政治、軍事或者意識形態對峙的產物。

一 國際化視角下的金門研究

金門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兩岸關係史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溫度計」與「體溫表」效用。對金門展開個案研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價值。正如美國經濟政治學者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所言：「個案研究的好處在於較之其他研究更為深入，它能让讀者更為清楚地看到一個事件發生的內在因果關係(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①但是，正如宋怡明所承認的，「代表性與特殊性的爭論是任何從事地方社會史研究的學者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冷戰島》一書對金門這個特殊地區的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冷戰史的新解釋框架，它不再簡單地將金門視為政治、軍事或者意識形態對峙的產物，而是通過「在不同的場域發生卻有着廣泛相似的文化與社會演變過程來研究它」(頁12)。可見，個案研究對於歷史細節的描繪，較之宏觀研究更有利於讀者深刻理解歷史大背景下事物內部的運作機理，以及其對宏觀場景所作出的反應與調適。對此，《冷戰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樣本。

在資料運用上，《冷戰島》亦頗值得稱道。宋怡明除運用官方檔案(包括村莊一級)外，還運用前人留下的170份口述資料。此外，作為一個外國人，作者親赴金門開展田野調查，與70餘名受訪者面對面地交流，獲取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口述資料對於社會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正如國際著名口述歷史

研究專家、英國學者湯普遜(Paul Thompson)所說：「就最一般的意義而言，一旦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經驗能夠作為原材料來利用，那麼歷史就會被賦予嶄新的維度。」^②《冷戰島》一書中口述資料的使用，為讀者展現了一個「從下而上看金門」的獨特視角。

《冷戰島》雖以自1949至1990年間的金門地方史為研究對象，但卻將其置於全球冷戰格局的背景下來考察，即以一種國際化的視角來研究地方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獨立封閉的現狀被外來力量所打破，從此以後中國近代史的演進均被塗抹上了濃厚的世界色彩。如論者所言，「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中國史，應該突出中國的國際化發展和現代化這個主體。」^③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乃至當代史，必須擺脫就事論事的藩籬，而是要有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探究事件發生背後的國際因素，這樣才能對研究對象予以更為深刻的理解。如在本書案例中，自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古寧頭戰役的失敗開始，圍繞金門發生的一系列軍事政治事件，不僅與北京、台北以及華盛頓三者之間的政策取捨密切相關，更與當時全球的冷戰格局演變相纏繞。

此外，《冷戰島》也體現了作者在中國研究中「中國中心觀」的取向。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認為美國學界有關中國研究應該發展出一個「中國中心觀」的取向，其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突破將中央政府及省級精英作為考察對象的傳統研究範疇，而「新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中國社會的下層」^④。

《冷戰島》雖以1949至1990年間的金門地方史為研究對象，但卻將其置於全球冷戰格局的背景下來考察，即以一種國際化的視角來研究地方史。此外，該書也體現了作者在中國研究中「中國中心觀」的取向。

在《冷戰島》中，作者並未將研究重點放在影響金門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精英人物身上，甚至連金門當局內部的領導人物都未進入其研究視野，如對金門防衛司令部早期司令官胡璉也僅一筆帶過，而將研究對象確定為金門普通民眾，這些基本都是通過作者在金門進行田野調查並開展口述資料搜集而實現的。可見，從全球冷戰格局下研究地方社會史，考察一個地方內部社會結構的變遷，體現了國際化研究視野下的「中國中心觀」，正是本書的最大亮點所在。這種國際化的研究視角，能夠「跳出個案看個案」，對於推進個案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在《冷戰島》中，作者借用了「地緣政治化」(geopoliticization)與「軍事化」(militarization)兩個概念，並將其貫穿全書始終。1949至1990年間的金門，一直與這兩個概念糾纏在一起，並對其內部社會文化歷史變遷，乃至民眾日常生活、集體記憶產生了巨大影響。

《冷戰島》全書由四章構成，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詳細敘述了冷戰格局影響下的金門社會文化變遷。第一章主要以1949至1960年為時間段，指出金門在台海局勢以及國際地緣政治關係佔據特殊位置的原因，以及台灣當局在該地針對不同時局實行的軍事管制，並分析這種特殊管理形式如何重塑金門民眾的日常生活。第二章主要按照編年順序，闡述金門軍事管理機構在1960及1970年代管理形式的兩次大轉變，從創造「三民主義模範縣」到建立持續軍事化的村莊系統，如建設「戰鬥村」以及地下坑道等，考察

複雜地緣政治演進軌跡中的金門。第三章分析了金門軍事戒嚴時期(1949-1992)金門社會生活的不同方面，例如經濟的軍事優先特徵，女性群體如軍妓、軍嫂、女兵等，以及該地的鬼神崇拜等；第四章介紹了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台灣去軍事化與後軍事化時期金門的社會生活，重點分析人們如何對軍事管制時期進行記憶、紀念，乃至如何將其用來為當前經濟發展服務等。

從《冷戰島》一書可以窺知，冷戰格局下的地方史研究，為打破國際關係史與國別史之間的隔閡提供了新思路。在全球冷戰背景下，金門既是國共兩黨爭奪的目標以及國民黨軍事化治理的對象(國別範疇)，又是全球兩大陣營攻守的戰略陣地(國際關係範疇)。該地的攻守勢易、軍事化與去軍事化，均是冷戰格局下各方勢力競逐的實力消長體現。但在既有研究中，國際關係史研究者往往關注國內局勢對於領導層制訂對外政策的影響，而國別史研究者則相反，往往偏重注意國際形勢對於其國內政策的制訂。因此，兩者的研究結論往往容易出現一定程度的「失真」。以金門為例，該地的歷史不僅包括了「冷戰格局下的外交與軍事危機」，還涵蓋了「日常生活的全新模式」(頁254)，因為金門不僅處於地緣政治衝突且被大國干預的焦點，還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歷史文化，故僅關注其一個方面的研究取向，難以覆蓋金門社會史發展的全貌。《冷戰島》一書則以地方史為敘述中心，並將其置於國際冷戰整體格局演變的大背景下，生動地揭示了一個島嶼在冷戰格局中的命運走向。

在《冷戰島》中，「地緣政治化」與「軍事化」兩個概念貫穿全書。1949至1990年間的金門，一直與這兩個概念糾纏在一起，並對其內部社會文化歷史變遷，乃至民眾日常生活、集體記憶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 冷戰格局演變下的金門軍事化進程

1949年，台灣當局頒布《台灣省戒嚴令》以及此後的古寧頭戰役，使金門的軍事化進程大大加快。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宣布台灣海峽為「中立區」，並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以「阻止海峽兩岸之間的軍事進攻」，這直接將原本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升級為「全球冷戰格局下的一部分」(頁25)。表面上看，杜魯門是宣布台灣海峽中立，但實際上是阻止大陸對台灣的進攻。美國此時的插手，使得原本岌岌可危的台灣政權，頓時轉危為安。蔣介石由此決定將金門作為「對抗全球共產主義且象徵與維護自由的橋頭堡」(頁26)。

古寧頭戰役結束後大約一周內，根據《台灣省戒嚴令》，台灣當局在金門設置了總攬一切事務的防衛司令部，並一度將金門縣政府凍結及暫停選舉。金門地區由此開始了持續近五十年的軍事化歷程。金門的特殊地緣政治使該地的權力結構演變直接受全球冷戰格局制約，具體體現為該地的軍事化與去軍事化。以縣政府的存廢為例，古寧頭戰役後，金門相繼迎來了一名美國國會議員和《生活》(Life)雜誌的記者，在他們的宣傳下，金門成為西方反共產主義者訪問亞洲的必經一站。為了爭取美援，「讓金門繼續直接處於軍事機構管理之下無疑『有礙國際觀瞻』」，因此，台灣當局於1953年重設了金門縣政府，其

目的在於提供「自由中國對抗紅色中國」的樣本(頁27)。可見，新設立的縣政府基本是有名無實的，金門仍然處於軍事當局的管理之下。

從1950年代起直至1990年代初，金門權力結構的軍事化特徵大致未發生變化：金門最高權力者為金門防衛司令部，在司令部下設政治作戰部，作戰部直接領導戰地政務委員會。這個政務委員會負責金門的實際管理工作。政務委員會內設常委會及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為了充分控制縣政府，政務委員會在辦公室內比照縣政府各部門設立相應的監督機構，保證金門防衛司令部對於縣政府的支配。除了金門縣政府以外，台灣當局還在金門建立了國民黨組織，後者仍然受政治作戰部下設的特別局管理。這種軍事化特徵一直持續到1992年軍事戒嚴在金門被撤銷為止。

同時，金門基層權力結構在這個階段同樣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據統計，1949年末金門大約有150個行政村，為了強化對村莊的控制並實現資源吸取，金門防衛司令部決定繞開原有的村莊政治精英，按照自己的標準遴選村莊負責人，其基本標準為「能說國語(Mandarin)和有一定文化水平」(頁31)。但在村莊中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大多為年輕人。因此這些新任命的村長大都比較年輕，有的甚至年僅二十五歲。他們與村莊聯繫很少，但易為軍方所控制。這些新的村莊精英隨之代替原有的成員活躍在村莊的政治舞台上，「變成了新地方政治精英中的核心人物」(頁30)，進而改變了村莊原有的權力結構，那些年長或者在海外運營且財力頗

根據《台灣省戒嚴令》，台灣當局在金門設置了總攬一切事務的防衛司令部，並一度將金門縣政府凍結及暫停選舉。金門的特殊地緣政治使該地的權力結構演變直接受全球冷戰格局制約，具體體現為該地的軍事化與去軍事化。

豐的頭面人物則不再活躍於村莊的政治舞台。但新上任的年輕村長並不能忽視他們的影響，很多事情常常徵詢其意見。可見，儘管新式精英上台，原有的「保護型經紀」^⑤仍然繼續發揮作用。

或許正是出於對這些新式精英的不信任，軍政當局還向每個村莊派遣了「政治指導員」（1956年後改稱為「副村長」）。這些人的到來，繼續改變着村莊原有的權力結構。作為軍政當局的代理人，他們的權勢很大，幾乎包攬一切地方事務：「除了生孩子，副村長甚麼都要管。」（頁33）他們負責登記人口往來、實行聯保制度、建立路條制度（村民外出必須得到其簽字的路條），可見「政治指導員、家庭成員登記、五戶聯保以及其他防禦系統一起，構成了一個全新而又嚴密的金門監控政權」（頁35）。這些都是出於對來自大陸可能滲透的一種防範。村長則成為調節副村長與其他村民之間衝突的紐帶。但遺憾的是，作者

僅注意到了村長在兩者之間的平衡與調節作用，而對他們這種身處其間的兩難困境以及由此給村莊權力結構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其關注稍顯薄弱。

196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越南共產黨對南越發動的「春季攻勢」以及朝韓關係的緊張等，直接導致金門軍事化程度進一步強化。為了防禦可能到來的戰爭，金門在每一個行政村掀起了「戰鬥村」計劃，提出「人人是戰士，村村是堡壘」的口號，積極開展全民動員。原本只是協助後勤運輸的民兵，也被作為正規作戰力量使用；婦女被要求承擔後勤保障、照顧傷患；12至15歲的孩子則組成「幼獅隊」，負責對村莊進行巡邏以及維持交通；11歲以下的孩子與56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則集中訓練來協助疏散人群。

與1950年代初期不同的是，此次備戰將民眾的職責進行了具體細化。書中指出，「每個村莊內外

1970年代以來，特別是隨着中美與兩岸關係回暖，金門面臨的戰爭危險並不突出，但其軍事化傾向反而愈加明顯。作者認為：「政治背景而非軍事因素，成為推動金門本階段持續軍事化的重要因素。」



古寧頭戰史館（資料圖片）

處於全球冷戰格局之下的金門，在被建構起抵制共產主義入侵的政治象徵的同時，也充分折射出了冷戰國際性邏輯在金門的本土性表達。這有助於從金門內部來反觀冷戰對於地區社會的影響。

部環境都被軍事化了，都必須服從於軍事計劃者的意圖」(頁104)。在這種情況下，金門民眾的不動產往往被徵用於軍事，「儘管金門方面向大陸的政治宣傳中強調保護私有財產，但他們自己的財產卻並未如此地得到保護」(頁105)。頗有意思的是，這種「戰鬥村」的建設思路，為台灣派出支援南越的技術人員所習得，在這些人的建議下，1968年台灣國防部對「戰鬥村」進行了專題研究，並決定將其運用於金門，防止對岸大陸的滲透。這亦從另外一個層面揭示了此階段金門軍事化的國際背景。

奇怪的是，1970年代以來，特別是隨着中美與兩岸關係回暖，金門面臨的戰爭危險並不突出，但其軍事化傾向反而愈加明顯。對此，作者認為：「政治背景而非軍事因素，成為推動金門本階段持續軍事化的重要因素。」(頁110)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及中華民國喪失了在聯合國中的席位，其國際地位每況愈下。哪知屋漏偏逢連夜雨，台灣中產階級在經濟飛速發展中不斷壯大，他們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使得國民黨在台灣內部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因此，對於國民黨而言，通過對金門持續軍事化控制並繼續強調外來威脅，轉移內部的視線，則有利於「保證其繼續進行權威統治而規避政治改革」(頁111)。這種方式或許短期內能奏效，但國民黨必須正視迫在眉睫的政治改革訴求，方能保證台灣的社會經濟秩序。1987及1992年，台灣相繼宣布撤銷《台灣省戒嚴令》與解除對金門的軍事戒嚴，即開始了對金門的去軍事化。

1992年11月7日，台灣當局最終宣布撤銷金門的軍事戒嚴以及戰時管理機構，將行政權完全交予金門縣政府，撤銷農村中的副村長，同時減少在金門的駐軍。這些措施的陸續完成，標誌着金門最終完全實現了去軍事化目標。對此，《冷戰島》指出，金門「去軍事化過程，正如軍事化一樣，使得金門地方社會仍然與國家、地域及全球地緣政治緊密纏繞在一起」(頁199)。全球冷戰格局的終結、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最終改變了金門的軍事化命運。但對於執掌行政權的金門縣政府與民眾而言，如何迅速減少由此帶來的經濟衝擊，改變近五十年來形成的軍事化發展路徑依賴與生活方式，則是另外一個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

三 本土性邏輯表達：金門內部的日常社會生活

作為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蘊含了全球格局與國家(地區)內部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此即為冷戰研究者所稱的冷戰國際性與本土性邏輯。根據照這種觀點，有論者認為，「冷戰與革命的內在聯繫和互動關係使其表現出作為國際史的冷戰和作為各國革命史(內戰史)的冷戰的雙重邏輯」，所謂「本土性邏輯」，則是指「冷戰的具體過程中，體現冷戰國際性的邏輯延伸到某一國家和地區時與其本土性因素相結合並轉化為本土性因素主導的鬥爭邏輯」^⑥。處於全球冷戰格局之下的金門，在被建構起抵制共產主義入侵的政治象徵的同時，其時代命

運的更迭也充分折射出了冷戰國際性邏輯在金門的本土性表達。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指出：「一種同一的、總的動因會對不同的局部產生不同的影響，因為每個局部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同樣的動因所驅使的各種力量做出反應並起到自己的作用。」^⑦可見，探究冷戰邏輯在金門的本土性表達，有助於從金門內部來反觀冷戰對於地區社會的影響，如金門軍事化時期的社會生活、集體記憶等。對此，《冷戰島》亦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探究這種本土性邏輯表達，亦與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新趨向相契合。正如沈志華所論，這種新趨向即「突破傳統國際關係史研究的範疇，把經濟、文化、社會納入觀察視野」^⑧。《冷戰島》一書以時間先後為敘述脈絡，研究了金門不同時段的民眾日常社會生活。1954與1958年炮擊金門是當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儘管該事件是一個國際地緣政治演進的產物，但它給金門民眾的日常生活影響卻持續了二十餘年之久 (頁77)。如為了躲避隨時降臨的炮彈，人們種植、收割以及做飯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一些人不得不在炮擊停歇期間，抓緊時間去地裏收穫成熟的土豆 (頁69)。那些尚未修築掩體的金門民眾，為了躲避炮彈，運用傳統的鄉村社會關係網絡，四處投親靠友，共度難關，「當炮擊過後，有這個共患難的經歷，使兩家人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 (頁70)。可見冷戰格局下的金門鄉村社會內部關係，更是因為軍事衝突而進一步強化。

1958年炮擊金門的發生與化解，亦存在特殊的國際化背景，同時給金門民眾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響。蔣介石儘管拒絕放棄金門，但考慮到金門民眾的安全，以及「避免給外界留下台灣方面不顧金門老百姓安危的負面形象」，決定將金門居民大量遷移到台灣本島。這對於金門居民而言，是走還是留，將直接對他們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炮彈與生計的威脅，都迫使他們艱難地做出抉擇：「若不去台灣，可能會被炮彈打死；若去台灣，可能會被餓死。」 (頁74) 最終，佔金門總人口約15%的民眾選擇遷往台灣本島。這些留下與離開的人，將會出現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迹。作者指出，儘管有台灣政府的援助及安置，赴台的金門人命運各有不同，但「大多數人都基本難以成功〔致富〕」；反觀一些大膽留下的人，則用極低的價格購買大量不動產，最終成為今天金門的富有群體 (頁75)。可見，大歷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往往難以擺脫前者對他們的掌控，這種命運走向，體現為冷戰格局下國際性邏輯在金門的本土性表達。

1960年代，在台灣當局的支持下，金門的土地改革更是這種本土性邏輯表達的生動體現。金門土改進行得十分順利，沒有出現暴力、血腥的激烈鬥爭階段，其主要目的則體現為一種宣傳策略，「它試圖將國際注意力轉向此時大陸地區的暴力土改，同時爭取對其反攻大陸的國際同情」。與主流觀點相抵牾的是，宋怡明通過訪談後發現，受訪者大都對土改評價不高，因為土改時「一些較為肥沃的土地

1960年代金門的土地改革是本土性邏輯表達的生動體現。宋怡明指出，台灣本土經濟因土改而獲益頗多，但土改既未推動金門經濟的發展，也未引起其社會轉型。金門土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凸顯海峽兩岸行政管理的差異。

金門民眾集體記憶中的冷戰烙印十分明顯。在宋怡明的訪談中，他們往往以「國軍撤退到金門」、「1958年炮擊金門之前」、「金門炮戰時期」、「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四個階段來構建其對金門數十年來的集體記憶。

往往被軍隊佔據」，而且土改結束時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軍隊手中。軍隊大量佔有土地的事實，使民眾難以直接嚐到來自土改的好處。在訪談中民眾很少談及土改，反而不斷地向作者嘮叨「自己房屋的被損壞或門板被部隊拆卸」（頁125）。

宋怡明指出，台灣本土經濟因土改而獲益頗多，但在金門卻並未如此，土改既未推動金門經濟的發展，也未引起其社會轉型。金門土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凸顯海峽兩岸之間行政管理差異的考慮，而不是為了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頁126-27）。政府主導下的基礎設施投資，例如交通網絡建設、灌溉工程等，大都有着特殊的軍事背景。而金門不穩定的政治形勢使投資與原料供應較為短缺，這些都使「工業在金門不可能扮演一個關鍵角色」（頁129）。可見在軍事化時期，金門的經濟始終難以擺脫地緣政治因素的禁錮而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女性始終是金門軍事化時期的重要話題。《冷戰島》一書對金門的軍妓、軍嫂乃至女兵群體進行了研究，以揭示當時女性在金門軍事化社會中潛在的位置。從社會性別來理解權力的存在與作用，同樣是一個新視角。對此，美國歷史學家斯科特(Joan W. Scott)指出：「性別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參照，通過它，政治權力得以被構想、合法化和被批判，它不僅僅是建立起男女性別對立的意義……。性別的雙邊關係與其社會化過程都是權力內容本身的組成部分。」^⑩但作為金門軍事化權力正常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金門女性群體在其中的地位始

終從屬於該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安全，因此不可能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婦女解放」（頁180）。例如，在1949年後大陸公開宣布消滅娼妓現象之時，在金門的駐軍中卻為了保證地方治安而出現軍妓這一特殊職業群體。也就是說，軍妓現象附着於金門的整個軍事化進程之中。可見，該時期金門女性建構起來的權力形象，更多的是對冷戰本土性邏輯的觀照，而不能反映女權自身的社會化進程。

1992年，伴隨着軍事戒嚴在金門被撤銷以及全球冷戰格局的終結，由此帶來的去軍事化再次給金門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大影響。宋怡明指出，軍事戒嚴撤銷伊始，不僅未給民眾帶來好處，反而一度造成了金門經濟蕭條。如金門駐軍的銳減，造成「貨物銷售量直線下降，這些消費者的離開，更使一些商店倒閉」；而那些依賴軍隊發展起來、甚至一度成為金門經濟中心的城鎮迅速衰落，有的還因為常住人口減少而淪為「鬼城」(ghost towns)（頁211、212）。為了盡快從去軍事化造成的陣痛中恢復過來，金門開始大力發展旅遊業，主要依託原有的軍事資源，如坑道系統、古寧頭戰役遺址等；當地特產名氣也增長起來，如炮彈殼製作的菜刀、高粱酒等。據統計，1994年前往金門旅遊的總人數達到35萬，其經濟也很快得到恢復（頁210）。從金門去軍事化造成經濟震盪，到利用原有的軍事資源發展旅遊業，更是冷戰格局下地區命運轉變的生動寫照。

集體記憶是從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更是冷戰本土性邏

輯的生動體現。金門民眾集體記憶中的冷戰烙印十分明顯。在宋怡明的訪談中，他們往往以「國軍撤退到金門」、「1958年炮擊金門之前」、「金門炮戰時期」、「中國大陸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四個階段來構建其對金門數十年來的集體記憶。經過仔細梳理，作者將他們對1949年以來的歷史敘述分為「追憶戒嚴法時期他們所經受的遭遇」、「地方性知識的解釋」以及「思鄉懷舊」三個方面（頁227-40），但這三方面的內容並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纏繞在一起的。因此作者認為，對於金門軍事化時期的理解，「必須涵蓋這些不同回憶模式」（頁240）。民眾對金門軍事化時期日常生活的講述，不僅對我們理解冷戰本土性邏輯在個體或群體身上的具體演繹提供了翔實的證明，而且亦能通過它們反觀冷戰國際性邏輯在地方社會的呈現乃至變化脈絡。

四 簡短的結語

《冷戰島》一書以翔實的史料基礎與國際化的研究視角，對冷戰階段（包括後冷戰初期）金門的社會生活史進行了精細研究，深刻揭示了冷戰格局操縱下的地區命運走向。眾所周知，就事論事、視野狹窄乃是個案研究的大忌，但作者「跳出金門看金門」，將金門地方社會史置於全球冷戰大背景下考察的研究思路，並在克服語言溝通及文化隔閡等多種制約因素下完成本著作，更是充分彰顯了該書的重要學術價值。

註釋

① Dorothy J. 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

② 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覃方明等譯：《過去的聲音——口述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5。

③ 陳謙平：〈國際化發展：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新視角〉，《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頁135。

④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88。

⑤ 關於村莊的「保護型經紀」與「贏利型經紀」的異同闡述，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⑥ 余偉民：〈國際鬥爭與本土革命：冷戰邏輯的解讀——從《冷戰與革命》看冷戰史研究範式的創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頁23、24。

⑦ 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6。

⑧ 沈志華：〈近年來冷戰史研究的新趨向〉，《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6期，頁80。

⑨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1986): 1073.

民眾對金門軍事化時期日常生活的講述，不僅對理解冷戰本土性邏輯在個體或群體身上的具體演繹提供了翔實的證明，而且亦能通過它們反觀冷戰國際性邏輯在地方社會的呈現乃至變化脈絡。